

《前茅》是郭沫若继《女神》《星空》《瓶》后编辑问世的第四部诗集,包括序诗在内该诗集共有23首诗歌作品,1928年2月10日作为创造社丛书第22种,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前茅》是写于1921年至1924年间作品的合集,其中《暴虎词》创作于1921年,《黄河与扬子江对话》《哀时古调》两首创作于1922年,仅有《太阳没了》是1924年的作品,其余18首诗歌均创作于1923年,上述这些诗歌在结集为《前茅》前绝大多数都已经在《孤军》《创造周报》等报刊上刊发过。

读过《前茅》的读者,应该都能感受到它是一部充满“正能量”的战斗檄文,是一首首提振精神的励志诗篇。我们随口诵读其中的诗句,如“我们把伸着的手互相紧握吧!/我们的赤脚可以登山,可以下田,/自然的道路可以任随我们走遍!”(《前茅·上海的清晨》);“我的耳边突然有雷默的声音怒吼:/你我都是匿暗净魔的太阳,/各乘赤城的炬火,前进!前进!”(《前茅·太阳没了》)都能感受到诗句所传递出的催人奋进的强大力量,甚至有些诗句就直接催促你勇往直前,如“前进!前进!前进!/胸中有热血沸腾,眼中有热泪滚滚,我们前途的行军,不是蔷薇的路径。/前进!前进!前进!挥起我们的镰刀,/开路上荒荆!”(《前茅·前进曲》)殊不知,类似上述语气的诗句直接成为郭沫若一场大病后的精神救赋和振作方向的济世良方。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郭沫若便不顾生命安危毅然决然南下参加了南昌起义,并在途中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郭沫若绕道香港返回了上海,此后便隐居在蹇乐安路的一所民居之中。但是非常不幸的是,郭沫若到上海后不久便病倒了:“十二月八号的晚上,我突然得了重病。头痛,四十度的高热,脸色发红而带浮肿,两眼充血。……第二天睡了一天,病情毫无起色,经过日本医生的诊察,疑是斑疹伤寒。于是在第三天上便不能不进病院了。”最后病情不断加重,甚至于“完全失掉了知觉。不断发出谵语,时而表现狂暴。听说在最严重的时候,医师已经关照了安娜,可以准备后事了”。虽然经过一个月的治疗后,他病情不断好转,但是身体依然非常虚弱,“回家的时候还不能走路,上楼是两脚两爪爬上去的”。

郭沫若此时患上重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他跟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辗转临川、宜黄、广昌、瑞金等多地,身体极度劳乏,最后也因体力不支与作战部队走散,毕竟郭沫若还是一介书生,行军打仗并不是他的特长,况且他也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这种转徙游击式的行军对体力的要求肯定要超出了常人所能承受的范围,最后郭沫若不得不绕道香港后才平安撤回上海。再有,郭沫若自被国民党通缉后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中,必然会优劳成疾,外界任何的变化都可能使他脆弱而敏感的神经处于崩溃的境地。蛰居在上海蹇乐安路并非非是长久之计,随时可能有被国民党捕捉的危险,



郭沫若

为此中央决定将郭沫若的全家送往苏联避难,在12月5日得到通知将于次日有人来接往海参崴,郭沫若得到此消息后非常兴奋,终于可以重获自由与新生,但是在临行前却被告知,计划取消,至于何日启程未有定数。由不期而遇的极度兴奋到意想不到的彻底失望所造成的巨大心理落差,使郭沫若一病不起,为此也错过了12日前往苏联的客船。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中央决定他还是先暂时前往日本避难。

处于彷徨、苦恼、困境中的诗人革命家郭沫若,要摆脱眼前精神窘境的直接方式,便是到自己曾经过往的人生经历中去寻找精神支撑点,重新唤起继续奋进的勇气。创作于后《女神》时期,《力的追求者》《上海的清晨》等20余首诗歌便在郭沫若脑中显现而出,那时正是他意气风发、挥斥方遒之时,年轻的郭沫若等创造社同仁犹如一颗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照耀在“五四”文坛的上空。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无顾忌、最有自信、最能战斗的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借助于诸如“在这黑暗如漆之中 太阳依旧在转动,/他在破砺他犀利的金箭 要把天魔射死”(《前茅·我们在赤光中相见》)的诗句,郭沫若驱散盘桓于内心中的苦闷,背负起革命重任远赴日本,保存战斗的坚定信念,迎接满血复归的艰苦斗争。

二

《前茅》的序诗中郭沫若特别强调了“这是我五六年前”的声音,这是我五六年前的喊叫”(《前茅·序诗》)。的确《前茅》所收录的是郭沫若在1921年至1924年间所创作的诗歌,其中既有白话新诗,也有古诗体,虽然是“旧诗重提”,但并不是旧思想、旧观念的重复,而是在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郭沫若革命精神的理性升华和前进方向的明确指南,尤其是赓续了“五四”青春中国的反抗力量,成为“革命时代的前茅”。

尘封往事

□李霄明



次回哈尔滨是另有任务。因他与父亲都喜爱文学,又想把磐石游击队发生的那些惊天动地的感人的战争故事与父亲分享,才找到父亲讲述这段对他而言是不能忘记的记忆。这次在哈尔滨短暂的相见,也是他们不曾想到的永别。

1945年,日本投降后,父亲带领延安文艺工作队从延安回到离别了11年的东北,才听到傅天飞已经在几年前就牺牲了的消息。

那天傅天飞用了一天的时间,给父亲详细讲述了他们是怎样创建磐石游击队的,以及这支年轻的队伍发展壮大后的悲壮故事。他要求父亲一定要写下来,父亲知道傅天飞也能写,就劝他自己写。傅天飞却说,谁写不是首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故事传下来。讲给你,就是多一份保险,咱们两个人两份“腹稿”要保险的多,万一我和你一个……将来总能剩下一个人来写。为了更加保险,父亲又把傅天飞讲的内容原原本本地讲给了萧军和萧红。萧军、萧红听后也非常感动,当即请求父亲再约傅天飞重新讲给他们俩。就这样,父亲又把傅天飞请到二萧家里,做了长时间的复述。后来,萧军完成了《八月的乡村》,

旧诗重提

——《前茅》与它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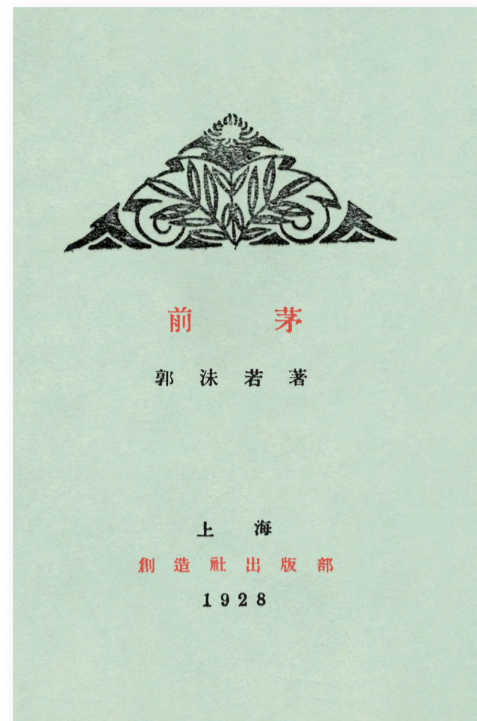
□张 勇

进方向的明确指南,尤其是赓续了“五四”青春中国的反抗力量,成为“革命时代的前茅”。

郭沫若横刀立马在“五四”文艺战场,在筹建与领导创造社的文学活动,与胡适、茅盾等文化名人的论争,以及创作《女神》、翻译《少年维特之烦恼》等系列文艺实践中萌发出初期革命思想的萌芽,那就是与旧社会、旧势力绝不妥协的反抗意识和抗争精神,他大声呼吁“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大革命哟,快起!起!起!快在这二十世纪的舞台上别演一场新剧!/人们哟,莫用永在泪谷之中献款!/你们把人权恢复了之后,/人类解放的使命,/世界和平的使命,/要你们二十世纪的两个新星双肩并举!/人们哟,起!起!起!”(《前茅·黄河与扬子江对话》)特别是1924年,《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的翻译对郭沫若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他不仅仅较为完整地翻译该书,并对原著的不足之处进行了更正,而且还对该译作者河上肇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围绕《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中的不同观点,郭沫若在与河上肇及其学生论辩过程中,更加坚定了自己对于苏俄革命模式和列宁主义的道路自信 and 理论认同,藉此郭沫若也实现了在理论认知上由单纯无序的反抗向马克思主义系统学理的转变与提升,他“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憎恨,对于社会主义怀着信心,如今更得着理性的背景,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

在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的感召下,郭沫若走出了狭小的书斋,投入到火热、残酷而真实的革命斗争现场之中。1924年郭沫若带领周全平等8人,深入到南翔、真如、尚儒村等宜兴战事的发生地展开实地调查,亲身感受战争给底层民众带来的疾苦与灾难,1925年5月,他在上海南京路的先施公司三层楼上亲眼目睹了“五卅惨案”发生的全过程。种种真实的社会现实情形,使郭沫若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仅仅只是靠诗歌、小说等文艺创作是改变不了中国现状的,广大文艺工作者们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革命与文学》)郭沫若说到了,也做到了,1926年7月,郭沫若跟随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从广州出发,正式踏上了北伐的漫漫征途。经过半年多的激烈斗争,北伐取得了战役上的胜利,但是革命成果却被蒋介石所窃取。郭沫若对这种倒行逆施的叛变革命行为气愤填膺,挥笔写下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讨蒋檄文,大声疾呼“同志们,我们赶快把对于他的迷惑打破了吧!把对于他的顾虑消除了吧!国贼不除,我们的革命永远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们数万战士所流的鲜血便要化成白水,我们不能忍心看着我们垂成的事业就被他一手毁灭。”(《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随后,他所寄予希望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却对蒋

介石采取容忍、纵容和妥协的态度。至此,郭沫若终于认清了无论是国民党左派还是右派,都不能领导革命中的中国走向胜利,他抛弃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坚决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正是在社会的大熔炉中,郭沫若历练精神、辨明方向,从而在人生道路的生死抉择时更加睿智和理性。



介采取容忍、纵容和妥协的态度。至此,郭沫若终于认清了无论是国民党左派还是右派,都不能领导革命中的中国走向胜利,他抛弃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坚决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正是在社会的大熔炉中,郭沫若历练精神、辨明方向,从而在人生道路的生死抉择时更加睿智和理性。

在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郭沫若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路线方针,他冒着被全国通缉随时被捕的风险,接受中共中央的召唤与任命,紧紧追随南昌起义的革命队伍,与革命者共进退、同生死。自1924年译介《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起至南昌起义失败隐居上海止,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但对于郭沫若来讲却是决定其一生的重要时段,他在思考和辩驳中接受了先进的思想理论,他亲自走向了中国社会的底层,走向了广袤的战场,亲身感受并认识到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戎马书生”是孙炳文在北伐战争临行前送给郭沫若的笔名,也是对革命年代的郭沫若的真实写照和形象比喻。书生有书生的革命方式与斗争策略,我们不能期望他们如战场上魁梧高大的勇士一样,肩扛炸药包,手握冲锋枪,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他们在血淋淋的真实战场上,寻找和探寻中国革命的理论、方法和道路,与攻城拔寨的战士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前

茅》即是郭沫若开始“戎马书生”生涯后的重要篇章,它在更高层次和实践层面上兑现了郭沫若早期的革命幻想和愿景期望。

三

《前茅》中的诗歌创作于《女神》结集出版之后,同步于《星空》与《瓶》,作为郭沫若同时期创作的作品,无论从诗体结构还是语言风格等角度来讲,《前茅》的美学价值和时代意义,并不逊色于其他诗作。

利用词句的反复和句式的重叠,表达作者情绪的起伏变化是《前茅》最显著的艺术特色。作为白话新诗主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女神》首创了“内在律”创作的先河,那就是借助于词语搭配和句式组合所产生的内在张力,展现出作者思绪情感的曲折发展变化,《前茅》中的多数诗篇也多延续此种创作方式,如在《留别日本》中“你们岛国的风光诚然鲜明,/你们岛国的女儿诚然诚恳,/你们物质的进步诚然惊人,/你们日常的生涯诚然平稳”,这样作者利用连续四句词语的重复,如《力的追求者》中,作者在三个分段的第一句分别使用了“别了,低回的情趣!”“别了,虚无的幻美!”“别了,否定的精神”等利用句式的不断反复,既可使诗歌的创作达到了外在形式结构的整齐划一,又可表达出由弱到强不断递进的情绪色彩。

丰富而具象性的意象塑造也使读者阅读《前茅》时更加直观生动。郭沫若善于从自然界和传统文化中寻求写作灵感,汲取写作素材,构建了《前茅》多样的意象群组,自然界中有太阳、黄河、扬子江等,历史传统文化中汉主、大禹、孙悟空等都被郭沫若作为诗歌意象纳入创作的视野之中,以此也弥合了诗歌文本与读者接受之间的鸿沟,使《前茅》的阅读更加自然贴切,如《太阳没了》《我们在赤光中相见》等诗歌皆是如此。

直陈现实社会的问题和矛盾,表达出作者鲜明的爱憎情感、强烈的战斗激情和理想主义色彩,并赋予了《前茅》厚实的社会价值。《上海的清晨》一诗中,作者在描述上海清晨的街头所见到的悲惨情景后,终于迸发出“兄弟哟,我相信:/就在这静安寺路的马路中央,/终会有剧烈的火山爆发。”

郭沫若虽自谦地认为“前茅并不高妙,只有点历史的意义”。(《离沪之前》)的确如此,如果仅仅从诗体本身来讲,《前茅》更多是沿袭了《女神》《星空》等诗集的创作风格,创新性并不强,但如果从承载的历史讯息来看,《前茅》中的诗篇寄寓了郭沫若在自己发展道路的抉择和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历史时刻,他的人生际遇、思想情感、价值选择等方面重要的信息密码,作者用旧诗重提的方式复述了一段生动起伏的命运传奇。



舒群

关押审查期间,父亲得到一些关照,监狱方面在他的要求下,给他提供了笔纸等用具,使得父亲在狱中完成了《没有祖国的孩子》的初稿。

在青岛的那段时间,萧军、萧红过得十分安稳平静,得以继续完成他们各自的文学创作,《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也是在此完成的初稿。在青岛时,父亲也在构思他的《没有祖国的孩子》,他早知道萧军在写傅天飞讲的那个故事。父亲跟我说过,当年他是想写这个故事的,因为他参加过抗日义勇军,有切身感受,更重要的是好友的重托。在哈尔滨时,他苦于做情报,没有时间写作,再加上写这个故事也没有那么急迫,所以父亲一直未能动笔写这个故事。此时父亲知道萧军在写,他自然就放弃了写这个故事的想,转而去构思《没有祖国的孩子》。《没有祖国的孩子》这篇作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酝酿出来的。

1935年7月,青岛警方限于当时证据不足,无法给父亲定罪,故而释放。出狱后,父亲身无分文,无奈之下,只好流落青岛街头。一日父亲去青岛码头,准备偷偷上船离开青岛去上海。就在他找开往上海的轮船时,迎面碰到了又一位哈尔滨东北商船学校的同学同班同学。这位同学给予了父亲鼎力帮助,使得父亲能安全离开青岛顺利抵达上海。到上海后,父亲先是借住在朋友塞克的家里。不久之后又通过熟人相帮,在法租界的波莱斯路美华里住下来。《没有祖国的孩子》也是在此处得以定稿并发表的。当时,父亲本想请萧军引见认识鲁迅先生,但令父亲没有想到的是,直到鲁迅去世,父亲都未能见到鲁迅先生。就在这段时间,同住美华里的女作家白薇无意中看到了父亲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的手稿,大为称赞,并亲自转送给当时“左联”的负责人周扬。周扬看过后,也给予了充分肯定与赞许,并委派夫人苏灵扬帮父亲做了最后的若干修订。最终《没有祖国的孩子》于1936年发表在全国性文学月刊《文学》第六卷第5期上,后编入上海生活书店发行的短篇小说集《没有祖国的孩子》中。

1937年,父亲受北平进步青年学生组织负责人马加、雷加约请,到北京大学与北平文学青年就《没有祖国的孩子》进行交流对话。碰巧,此时萧红也来北平小住。父亲受与萧红同病相怜的袁淑奇委托去看望一年多来不曾见面的萧红。父亲与萧红相见于一北平李活吾的家中,本来他们就是故人,此时此刻他们二人都非常高兴。为此,萧红把她带在身边萧红的鲁迅为之改过的《生死场》原稿,送给父亲留作纪念。在父亲离开北平返程之时,萧红对父亲说道,你对我 and 萧军的种种帮助,是我最不能忘记的,特别是在青岛的那段时间。



2014年影片《黄金时代》中,沙溢扮演舒群